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3004

程相占生态美学的跨文化建构与对话实践

薛平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程相占以“全球共同问题, 国际通行话语”为准则, 通过与西方环境美学的批判性对话、对中国传统“生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构建了以“生生本体论”为哲学根基、“生态智慧C”为价值核心、“生态审美”为基本范式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其生态美学理论既突破了西方相关理论的局限, 又赋予中国生态美学深厚文化底蕴与国际对话能力, 为当代生态批评提供了新的话语工具、价值标尺与方法论指引, 推动生态批评实现从现象描述到价值批判、从文学研究到文化实践的拓展, 不仅丰富了中国生态美学的话语体系, 也为全球生态美学贡献了基于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程相占; 生态美学; 生生美学; 生态智慧C; 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 B83-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3-0028-10

Cross-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ialogical Practice of Cheng Xiangzhan's Ecological Aesthetics

XUE 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ujiang Colleg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900,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addressing global issues through internationally accessible discourse”, Cheng Xiangzhan has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rough critical dialogue with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heng sheng” (generative) philosophy. This system is grounded in the “Sheng Sheng Ontology” as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centers on “Ecosophy C” as its core value, and establishes “ecological appreciation” as its fundamental paradigm. His ecological aesthetics not only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relevant Western theories but also endows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 with profound cultural depth and international dialogical capacity. It provides contemporary Eco-criticism with new discursive tools, value benchmarks,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promoting the expansion of Eco-criticism from mere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to value criticism, and from literary studies to cultural practice. Consequently, it not only enriches the discursive system of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 but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based solutions to global ecological aesthetics.

Keywords: Cheng Xiangzhan; ecological aesthetics; Sheng Sheng Aesthetics; Ecosophy C; cross-cultural

收稿日期: 2025-12-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化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书写研究”(22FZWB084); 海德堡大学“从全球视角建构世界”研究奖金“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的社会环境与人民生活”(2304578)

作者简介: 薛平, 女, 安徽铜陵人,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

中国生态美学虽起步晚于西方，却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实现跨越式发展，展现出独特的理论自觉与话语品格，成为国际环境美学、生态美学对话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声音。在这一领域，程相占是极具代表性、前瞻性与国际影响力的核心学者——他不仅深度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生态美学的学科化建设，更通过独创性的学术路径、系统化的理论建构与持续性的国际对话，为构建中国生态美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极具示范性的探索范式，其学术轨迹清晰呈现了中国生态美学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径。程相占的研究基于中国古典文论与文艺美学的深厚积淀，这种扎实的本土学术根基为其后续整合中西生态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新世纪，伴随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推进与生态美学研究的勃兴，他的学术视野发生显著转向：从文艺理论内部的文本细读转向对生态现实的深度关切，从单一的美学思辨转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一“生态转向”并非简单的议题转换，而是学术思想的深刻蜕变。它既是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积极回应，也是试图通过美学维度破解生态问题的路径探索，体现了中国学者以理论创新回应时代命题的责任担当。

中国学术研究如何在深耕本土传统的同时实现全球对话，既避免沦为西方理论的简单注脚，又防止陷入自我封闭的循环，始终是众多学者面临的学术困境。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研究之所以具有重要价值与独特性，就在于其以深刻的理论自觉对这一时代命题作出了创造性回应。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1]的学术观点，其生态美学建构由此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双向运动”：一方面，他深入西方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研究前沿，和伯林特、卡尔森等国际顶尖学者开展“同步”对话与合作，对他们的理论资源进行批判性吸纳；另一方面，他果断返回中国传统“生生”理念，创造性地提出“生生美学”与“生态智慧 C (Ecosophy C)”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意在为全球生态美学贡献源自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程相占生态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由三个层层递进且彼此交织的维度构筑而成：其一，在学术研究层面，他实现了从文艺美学向生态美学的聚焦转移。这一转变，深刻反映出中国学者积极回

应时代命题，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高度自觉。其二，在理论构建维度，程相占以“生生”为本体、以“生态智慧 C”为内核，搭建起生态美学的理论核心框架。这一进程，不仅彰显出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强大能力，更赋予了生态美学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精神内核。其三，在实践路径方面，程相占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与国际同行开展平等对话。这一实践，充分展现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舞台的底气与自信，彰显了中国学者在全球学术格局中的责任与担当。深入探究程相占在中西思想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如何逐步构建起既带有鲜明中国身份标识又蕴含广泛全球启示的生态美学体系，并深入考量这一体系对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的理论指导价值，不难发现，其为当代中国学术在全球化浪潮下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一、学术历程与转向：程相占生态美学的生成背景与演进轨迹

程相占的生态美学思想展现出一条脉络分明的发展轨迹：它萌芽于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深耕钻研，最终延伸至具有全球视野的生态美学体系构建。这一发展路径并非简单的线性推进，而是源自深刻学术自觉的思想转向，其目的在于通过学术研究切实回应现实生态危机。程相占近三十年的学术历程，可明确划分为三个紧密相连、层层深入的阶段，其完整呈现了他的思想从夯实本土根基、拓展跨学科视野到理论体系成熟的演进历程。这一轨迹不仅凝结着学者个人的学术睿智，更在宏观层面映射出 21 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在应对全球生态挑战、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突破。

程相占的学术事业起步阶段起，就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美学传统的沃土之中，以对本土美学传统的深度挖掘为基石，密切观照其在时代浪潮中的现代变迁。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他将研究目光精准聚焦于中国古代文论和诗学的核心范畴，如琢如磨、深耕细作。这一时期的学术探索，为其后续生态美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不仅为他在方法论层面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其

在文化层面筑牢了认同根基。

1995年,程相占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其全面梳理了中国叙事诗的既有传统,探究其别样的美学价值。这项研究不光展现了他深厚的文献积累功夫,更体现出他别具一格的研究目标: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起步,力求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2002年问世的《文心三角文艺美学》堪称该领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这一阶段,他尤为聚焦“文心”这一中国传统文论的核心范畴,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个新颖的理论框架——“文心三角”结构模型(图1)。该模型以“心-体”互为映照为核心要素,延伸至“意、物、文”相互交织的三个维度,深入剖析文艺创作的内在机理^[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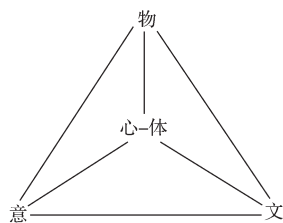


图1 “文心三角”结构模型

该模型的意义远不止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与解读,它更是在方法论层面展开了一场极具开创性的探索之旅。其最终指向是激活传统文论资源中潜藏的巨大能量,使其能够与西方现代理论携手共进,共同参与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之中,为中国文论的当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这种学术路径,以深厚的传统根基为依托,在坚守传统的同时积极谋求突破与创新,其为程相占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稳固支撑,使他在面对最为前沿、最具挑战性的全球性议题时,也能始终坚守中国学术的主体地位。

程相占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界,正好处于“方法论热”过后的阶段,学者们开始反思单纯引进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力求创建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程相占是这一学术潮流的典型代表,他尝试着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挖掘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文艺美学模型。这种尝试其实就是在践行文化自信以及理论自觉。在这个阶段,程相占也开始展现出跨文化研究的眼界,他不仅

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论,同时也在留意西方当代美学理论的进展。这种融合中西方研究特质的学术路径,为他后续的生态美学研究构筑了关键阶梯。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一系列理论的推出以及研究方向的转变,“就是试图借鉴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和美学资源来建构当代的生态美学”^[3]。

新世纪以来,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以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开端,催生了学术研究的全新语境,程相占的学术重心在这个节点发生了十分关键的“生态转向”。这一转变既是其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也是其自身学术逻辑的自然扩展。2005年,程相占参与主办“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最早把生态文明跟生态美学联系起来的学术会议之一。这次会议标志着他的研究视角开始从文艺内部规律的探究,转向对文学、美学跟人类生存环境之间联系的宏观审视。同一时期,他还先后主编《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出版《生生美学论集》。他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强烈的学术使命感,积极充当国际学术交流的桥梁,将国际上前沿的环境美学、生态美学思想引入国内,有力推动了中国美学研究与国际学术前沿的接轨。

程相占的学术转向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后有了更宏观的意义。随着“建设生态文明”战略目标的首次提出,生态环境保护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政策的转向为生态美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持和学术动力。程相占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他指出:“经过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的大力倡导,我国的生态美学建设更加自觉地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联系起来了,相关论著不断涌现。所以说,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为目标,是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首要特色。”^{[4]36}在这一阶段,程相占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尤为活跃。2006—2007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进行访问研究,这一时期的学习经历极大地拓宽了他的国际视野。2009年,他协助曾繁仁教授举办了“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伯林特、卡尔森、瑟帕玛等国际一流学者邀请到山东大学,推动了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此前他就作出了判断:生态美学不仅是生态学研究新的生长点,而且是美学研究的新生点,它将解决以往的美学,

特别是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学”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自然美”“人化自然”等问题）^{[5]74}。

程相占在这一阶段的学术工作呈现出鲜明的特质：其一，具备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他将生态危机这一“全球共同性难题”确立为研究的起点与终极归宿，始终紧扣这一关键议题展开深入探索。其二，展现出开放多元的研究格局。他积极投身于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交流活动，在广泛汲取国际前沿学术养分的同时，始终坚守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模式，不盲目跟从、不随波逐流。其三，彰显出浓郁且明确的本土关怀情怀。他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文化，深度挖掘蕴含其中的生态智慧，致力于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这一阶段程相占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当属2013年出版的《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一书。此书是他携手国际知名学者伯林特、戈比斯特、王昕皓共同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该书的一大亮点是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出版发行。这一举措不仅充分彰显了国际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更体现了中国学者积极运用国际通用学术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不懈努力，而这也正是程相占对其所倡导的跨文化生态美学建设理念的践行——“我们必须回答生态美学话语如何回应美学的国际化趋势”^{[4]38}。

历经前十年的深厚积累与不懈探索，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研究成功步入体系化构建与理论革新的成熟阶段。在这一关键时期，他早期精心积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期广泛吸纳的国际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自始至终坚守的批判性学术立场，终于实现了深度融合与升华，凝练为一套独具原创性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诞生的关键标志，便是“生生美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构建与系统阐释。程相占以《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等蕴含的深邃古典智慧为根基，运用现代哲学的思维方法与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其淬炼提升为“生生本体”生态美学的本体论核心，为生态美学领域注入了全新的理论活力与思想内涵。他对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生生’，第一个‘生’是动词，即‘化育’；第二个‘生’是名词，即‘生命’。因此，‘生生’就是‘化育生命’。”^[6]不仅如此，程相占更从中挖掘出“生生”与中国古代哲学中

“道”的基本特性的本质关联。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智慧C”的概念，其中“C”代表了包含“创造（Creating）”在内的九种内涵^{[7]174}，强调人类应协同自然对生态进行创造性护育。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对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生态智慧T”的回应，也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创新。程相占认为，与奈斯强调“自我实现”的生态智慧不同，中国的生态智慧更强调“参天地之化育”的创造性维度^{[7]182}。这一时期，程相占的研究成果丰硕而系统：2021年出版《生态美学引论》，构建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同年主编《西方生态美学史》，系统梳理了西方生态美学的发展脉络；2022年出版《当代西方环境美学通论》，展现了对西方理论的深刻理解；202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专著《中国生态美学与生态智慧》（Ecoaesthetics and Ecosophy in China），标志着其理论创新获得国际学界的认可。

这一阶段，程相占在多个维度展现出卓越的学术造诣与深远影响力。在理论建构层面，他的研究凸显出更清晰的系统性。他突破单一维度的局限，将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等多个关键维度融会贯通，精心搭建起一个完整且严谨的生态美学体系。这一体系逻辑严密、层次分明，为生态美学研究提供了全面而坚实的理论框架。在国际对话方面，他秉持同步性原则，遵循“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的准则，积极且主动地与国际学界保持实时互动与深度对话。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国际学术交流的大环境，及时了解国际前沿动态，同时也将中国学者的独特见解与研究成果推向世界舞台。在理论创新上，他更是充满活力。他并未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批判与吸收，而是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富矿，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主张。这些主张既立足中国实际，又具有世界眼光，为生态美学领域注入了崭新的思想活力。值得强调的是，他的这些创新理论已获得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2015年，加拿大知名环境美学家卡尔森在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编写“环境美学”词条时，将程相占的8篇论著列入参考文献。这一举措意义非凡，是中国学者在该领域获得国际认可的关键标志，彰显了程相占学术成果的国际地位。2019年，卡尔森又在《美学与艺

术批评杂志》环境美学专号上发表《环境美学、环境伦理学与生态美学》，文中不惜笔墨，专门对程相占的生态美学思想展开深入研究与探讨^{[8]4-5}。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程相占生态美学思想的独特魅力与学术价值，也预示着其理论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产生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程相占在这一时期承担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如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态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016年，具体负责子课题五“生态美学通论”）和“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构建”（2018年，具体负责子课题三“生态美学的中国当代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研究，为推动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观程相占的学术历程，我们可看出一条从“本土”到“世界”、从“承继”到“创新”、从“倾听”到“对话”的演进轨迹。奠基期的中国传统文论研究，为其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方法论视角；转向期的生态美学探索，令其学术视野得到极大延伸，进而搭建起跟国际学界相互对话的途径；成熟期开展的理论创新，最终构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体系，达成了从“跟着表达”到“接着表达”，再到“领着表达”的学术突破。三个阶段既相互分开，又紧密结合，一起组成了其生态美学思想的完整生成图谱。

二、对话与生成：程相占生态美学的思想资源与核心创见

程相占的生态美学思想造就的是一场跨越时空、融合中西的持续思想对谈，其理论体系的建构，表征了其对于多元学术资源的批判性接受、创造性转化与综合性创新。这一过程明显呈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针对西方现代及当代美学理论展开批判性对话；跟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开展具有创造性的对话；在全球学术空间里与国内外同行同步开展对话。正是通过这种多维度、立体化的对话，程相占慢慢确立了自身别具一格的生态美学思想路径与核心创见。

程相占在生态美学的建构进程中，将与西方理论展开批判性对话确立为逻辑起点与关键参照系，而其中与康德美学的对话沟通，更是一场具有奠基性价值的理论深耕。不同于部分激进环境美学家对康德美学采取的全盘否定态度，程相占秉持

理性与客观立场，肩负生态美学所承载的双重使命（既要回应全球生态危机对美学理论的挑战，又要推动美学理论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着重阐释了对康德美学进行再审视的深层目的与重要意义：“一方面是反思和批评现代美学的非生态乃至反生态因素，另一方面则是构建能够超越现代美学的新型理论。”^[9]他借对康德文本的深度重释，更为精准地剖析了“无功利性”概念的内在意涵。他指出，康德所主张的并非对审美对象采取冷漠态度，而是审美判断不应以对象实际存在所衍生的功利性因素为依据。这一研究工作意义重大，不仅敏锐地洞察到康德美学中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前提——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以表象形式存在）的分离状况，还为生态美学突破主客体二分的传统框架提供了关键的批判切入点。同时，还意外挖掘出康德哲学中可能潜藏的生态意蕴——对“物自体”不可知特性的承认。其体现了人类认知与价值的有限性，在哲学层面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或生态人文主义敲响了警钟、提供了启示。基于深刻的批判与富有创意的“解读偏差”，程相占主张生态美学应挣脱传统“静观”模式的束缚，向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审美范式转变。

与之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的，是他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领域的两位代表人物——阿诺德·伯林特和艾伦·卡尔森展开的深度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对于伯林特提出的“交融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程相占极为赞赏其打破主客二元对立格局、凸显身体多感官共同参与以及环境连续性的理论探索，同时也坦然承认，这一理论对自己的早期生态美学思考产生了直接且深刻的影响。他曾明确提出生态审美应“代之以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审美交融’模式”^{[7]87}。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伯林特理论可能存在的盲点——过于强调知觉经验的融合与连续性，而相对弱化了价值评判的维度，未能明确区分生态上有益与有害的“交融”。对于卡尔森所倡导的“科学认知主义”，程相占以对其批评者的反驳为起点，充分肯定了生态学知识对于深化自然审美体验、避免“肤浅审美”的积极意义。这与其强调“生态审美”需以生态知识为基础的主张不谋而合。他还特别强调，“生态学所关注的主要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

所以，生态欣赏所重点关注的应该是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7]85}。不过，他也批评了卡尔森理论中可能存在的“过度客观化”倾向——过于依赖自然科学范式而可能忽略了审美体验中内在的情感、伦理与文化维度。通过对这两位大家理论的批判性综合，程相占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概念——“生态审美”（ecological appreciation）。这一概念既吸收了伯林特的“参与”和卡尔森的“认知”理论要素，又超越了二者：它要求审美活动不仅是一种身心沉浸的体验，也不仅需要生态知识的指引，更根本的是，它必须受到一种生态伦理价值观的规约。其目的在于培育对生命共同体内在价值与系统关联的尊重。这种辩证扬弃，让他的理论规避了西方环境美学某些流派的片面性，展现出更强的整合力与批判性。

如果说与西方理论的对话旨在“破”旧立新，那么跟中国传统智慧的创造性对话则是为了“立”其根本，为其生态美学筑牢坚实的存在论根基并赋予其独特的文化身份。就这一维度而言，程相占的研究路径凸显了他学术理路中扎实深厚的中国古典文论与文艺美学根基。程相占通过对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思想的深入挖掘，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现代转化。他把对话核心架构在《周易》所体现的“生生”哲学基础上，推动了“生生之谓易”这一古老命题在现代哲学层面的阐释，实现了从古典宇宙论到现代生态存在论的创新性转换。他将“生生”解读为天地万物化育生命的动态过程和根本德性，并将其提升为生态美学的“生生本体论”。第一个“生”是动词，意味着创生、化育；第二个“生”是名词，指生命本身。由此，“生生”被提升为其生态美学的“生生本体论”，意指宇宙间生命不断创生、延续、繁荣的永恒过程。这一本体论设定，为中国生态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推衍出其生态美学的实践性原则与价值核心——“生态智慧C”（Ecosophy C），系统地勾勒出多个以英文字母C开头的关键词，如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儒家（confucianism）、存有的连续性（continuity of being）、创造生命（creating life）、通物/同情（compassion）、共同体（community）、共生（coexistence）等^{[7]174}，极大地丰富了其理论内涵。这一转变彰显出非凡的创新性，它以质朴而巧妙

的方式，将一个古老的东方哲学理念，转化为能够与国际生态哲学、美学话语进行高效对话的现代理论资源。如此一来，中国生态美学就不再仅仅是西方理论的附庸与简单旁注，而是发出了源自自身深厚文化传统又兼具人类普遍关怀的独特声音。此外，在总结生态美学发展进程的文章《生生美学的第二个十年进程》中，他再次阐明自己提出“生态智慧C”时，对中国传统生态美学资源走向国际化的思考。他巧妙援引庄子“通物之乐”的经典寓言，深入阐释跨物种感知与生态关怀的可行性；引用宋代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的优美诗句，生动阐发基于“以道观物”的生态审美态度^{[10]63-65}。凭借对传统资源的深度挖掘，程相占不仅为自己的生态美学理论厚植了本土精神底蕴，更使其在直面现代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时，贡献了一种迥异于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独特方案——一种强调万物一体、生生不息的中国生态智慧。

由此不难察觉，程相占的学术对话不是局限于文本与思想的浅层交流，而是一场主动出击、同步推进的全球性学术实践。这构成了其思想构建的第三个关键维度，即方法论层面的对话实践。他明确提出了“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的学术准则，强调真正的国际化并非简单的单向输入或输出，而是要立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这一时代大考，运用国际学术界能够理解与认同的话语方式，开展平等、双向、同步的交流与共建。他身体力行地践行这一理念：与伯林特、卡尔森等国际顶尖学者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往来与学术合作，携手撰写并推出中英对照的学术著作，让思想的火花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界限；持续在重要的国际英文期刊及论文集集中发表研究成果，直接投身于国际学术前沿的激烈探讨；主持西方美学史、生态美学通论等具有宏大国际视野的科研项目，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引领研究方向。这种高频次、深层次的国际沟通互动，使得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研究能够与国际学界的前沿研究保持同步，彻底打破了以往国内学界常常滞后西方几十年的“时间差”局面。他的工作不仅是在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体系，更是在积极参与构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生态美学。这种同步对话的实践活动，本身便是他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

其为中国学术如何真正“走出去”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示范。

特别要说明的是,程相占在建构中国生态美学体系时始终是自觉的,且目标十分清晰,他于《生态美学引论》中单设一章阐述建构生态美学中国话语的目的及途径,提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是指中国学者在参与国际生态美学构建的过程中运用中文所生产的学术话语,其四个关键词最初分别是生态文明、生生本体、生态存在、生态审美等。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补充两个关键词,即生态实在论和生态智慧C。这些关键词都是西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所没有的,其逻辑关系构成了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大致轮廓。构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须关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组建生态美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共同体、高度警惕并彻底摒弃阿Q式学术心态、不断反思美学观以聚焦审美问题。概括提炼国际生态美学构建过程中出现的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绝不是为了强调中国生态美学的民族性或本土性,而是为了倡导中国美学的创造性和世界性”^{[7]14-15}。更重要的是,程相占对中国本土生态美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上传播交流所面临的困难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知。他指出,如“生生美学”这般典型的本土话语,在中外理论对话中碰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是怎样将其精准翻译成国际通行的概念。不然,“生生美学就只能局限于地方性知识的狭小领域内而无法成为国际通行话语,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生态美学的同情理解就无法顺利实现,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战略就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好的愿望”^{[10]63}。

基于上述与中西方资源展开的双重对话以及广泛深入的全球化实践,程相占生态美学的核心创见得以清晰展露:它以“生生本体论”为哲学根基,筑牢理论大厦的基石;将“生态智慧C”作为价值层面的核心要义,彰显其独特的价值追求;把“生态审美”确立为基本范式,引领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一种新型美学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能有力回应全球生态危机,还能跨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实现伦理关怀与审美体验的有机统一。这一思想形成的过程,生动且形象地呈现了一位中国学者如何凭借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深厚的文化自信,在全球与本土的碰撞交融、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批判与建构的

动态平衡所构成的冲突张力之中,开拓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学术路径,为当代美学的发展贡献了来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

三、从理论到实践:程相占生态美学对构建当代生态批评范式的启示

作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生态批评旨在通过文本分析揭示人类与自然的整体性关联,以回应全球性生态危机。审视其发展脉络可见,国内早期生态批评多局限于对“自然书写”的浅层赞美与“环境破坏”的简单批判,尚未形成系统的哲学框架与批评话语体系。在此背景下,程相占构建的生态美学理论逐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该体系通过夯实生态美学的哲学根基,围绕“生生本体”“生态智慧C”“生态审美”等核心概念展开系统阐释,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与方法论指引。通过系统梳理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理论从哲学建构到批评实践的转化路径,重点考察其如何为生态批评提供创新的话语工具、价值评判标准及视野拓展维度,并结合具体文本案例,我们得以验证该理论在批评实践中的适用性与阐释效力。

程相占所创立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依靠对中西方哲学与美学传统的深度对话和创造性转化得以建立。他明确宣称,“生生美学”作为中国生态美学的核心范式,其哲学基础源于《周易》里提到的“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他对将“生生”视为“化育生命”的动态过程的阐释,突出了生命的产生、延续及繁荣属于宇宙的根本属性。这一“生生本体论”既为中国生态美学奠定了存在论基础,也给了生态批评根本的价值指引——生态批评要着力揭示批评对象是否体现了对生命创造力的尊重与维护。基于这一基础,程相占又进一步提出“生态智慧C”概念,强调一种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创新与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这一理论体系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具备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强劲实力,其成功搭建起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全球生态议题对话的桥梁。在此理论框架下,程相占对“生态审美”的内涵进行了创新性重构。他指出,生态审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景观欣赏,而是以生态学认知与生态伦理为基石、蕴含明确价值导向的审美实践活动,

是对“如何审美地和生态地进行欣赏”^{[7]185}的问题的回答。这就要求审美主体具备一定的生态认知，能够从生态系统健康的角度出发，对审美对象进行价值判断。因此，生态审美不仅关注对象的外在形式美，更关注其生态功能与伦理意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理论工具，使其对本文的批评不再停留于对其“自然意象”的简单识别，而是能够深入分析其所蕴含的生态意识与价值立场。可以说，对批评领域的关注始终是程相占生态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向。其要求审美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生态认知素养，能够立足生态系统健康维度，对审美对象展开价值评判。故而，生态审美不仅聚焦于对象的形式美感，更注重其生态效能与伦理价值。这一理论创新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更具深度的分析工具，使其突破对文本“自然意象”的表层辨识，转而深入挖掘文本潜藏的生态意识与价值取向。可以说，对批评实践的关切始终是程相占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着力点。他一直强调，“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我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生态批评上”^[11]，较早地对生态批评中的“生态文学批评”与“生态文化批评”作出了区分，并充分肯定了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价值。

可以发现，在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理论指引下形成的生态批评范式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该范式强调审美与伦理的有机统一，主张生态批评超越单纯的文本分析与形式解构，升华为兼具价值判断与伦理审视的批评形态——批评者在进行审美判断时，需将生态伦理维度纳入考量体系，重点评估作品是否传递了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价值取向，以及能否引导读者形成生态友好的审美认知。在具体批评实践中，针对自然写作或生态文学的评析，既要剖析其语言艺术与叙事结构，更要着重考察生态意识的思想深度与传播效能，尤其要关注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地方性知识的呈现。受文化生态学理论启发，程相占多次强调生态问题的文化地域差异性，这是因为“多种多样的地方性文化共同构成了地球上的文化生态系统”^[12]，生态批评同样要具备相应的文化灵敏性与语境适应特性。他赞同张嘉如等人把佛教思想引入生态批评的尝试。他提出“唯识生态批评”^{[13]31}，正是

为了打破西方理论一枝独秀的局面，助力批评实践走向本土化与多元化。这种取向让生态批评不再是那种普适性的理论套用，而是一种能进行文化对话的批评实践。通过倡导跨学科及跨门类的批评角度，程相占察觉到，生态批评刚开始聚焦于文学领域，但近年来已慢慢拓展至戏剧、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他支持杨慧芹等人所进行的“生态戏剧批评”^{[13]31}方面的探索，认为这种跨领域的批评实践有益于展现艺术与生态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他倡导生态批评应突破学科藩篱，充分整合生态学、伦理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资源，构建更具整合性的批评框架。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理论不仅为生态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更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支撑——其强调的“科学认知主义”审美观，主张公众需依托科学知识修正对自然的认知偏差，从而实现“合理的审美体验”。这一理念直接塑造了生态批评的实践路径：批评者既要具备文学艺术的解析能力，又需掌握基础生态学知识，方能准确判断作品是否真实呈现自然关系与生态规律。

生态批评长久以来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缺少有解释力的核心概念与话语体系，大量批评实践依旧依靠“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自然”与“文化”等二元对立的模式，难以克服传统批评的局限。程相占提出的“生生”“生态智慧C”“生态审美”等概念，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新的词汇及思考方向。这些概念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更具备鲜明的实践导向性，能够引导批评家以宏观的生态整体观为基点，对文本展开多维度、多层次的解读与探究。以李娟的《冬牧场》为例，传统生态批评或许会聚焦于其如何呈现草原风光的壮丽画卷，或赞誉其对游牧文化的忠实记录；而运用程相占的“生生”理念进行剖析时，批评的焦点则转向文本如何展现“化育生命”的动态过程。在《冬牧场》的叙事中，李娟细腻地刻画了人、动物、草原、气候之间的共生图景——牧民并非自然的征服者，而是生态系统生命循环的参与者，他们与羊群、马匹、草原形成共生演化的关系网络。批评家可据此分析文本是否体现对“生命共同体”的尊重，是否彰显极端环境下生命的韧性与创造潜能。这种分析超越了表层的审美鉴赏，深入生态伦理与存在哲学的维度，实现了批评深度的实

质性拓展。程相占提出的“生态审美”概念,为重新评估古典文学中的自然书写提供了新维度。诸多古典诗歌虽以自然为吟咏对象,但其内核多隐含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或将自然作为道德隐喻的载体,或将自然作为情感投射的对象。如王维的山水诗虽以“自然”为题材,但其审美取向仍以静观、遁世为旨归,缺乏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真正认同。相较之下,梭罗的《瓦尔登湖》因其对自然的细致观察、简朴生活方式的实践以及生态伦理的彰显,更契合“生态审美”的精髓。批评家可依据是否具备生态知识基础、是否体现生态伦理关怀等标准,对古今中外的自然书写进行重新估价,从而构建起具有历史纵深感与伦理厚度的生态批评范式。

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理论为生态批评确立了全新的价值坐标。传统文学批评主要围绕“文学性”“审美性”“思想性”展开价值判断,而生态批评需将“生态性”纳入核心评价维度。所谓“生态性”特质,主要考察作品是否彰显生态整体观、是否批判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否有助于培育读者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文明观念。这一价值转向要求批评家不仅是文本的阐释者,更应成为生态价值的倡导者与批判者。以阿来《云中记》的批评实践为例,传统批评可能聚焦于叙事结构、语言风格或民族寓言的维度,而生态批评视角则需进一步考察小说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回应生态灾难、如何理解“地方”与“神灵”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云中记》以汶川地震为背景,通过祭司视角呈现现代化进程对自然与信仰的双重冲击,其中“山川有灵”“万物有神”的观念与现代生态哲学的“内在价值论”形成跨时空呼应。批评家可运用程相占的“生态智慧C”中“通物”“共生”等概念,分析文本是否真正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是否提供了基于生态伦理的灾难反思与重建启示。这种批评实践不仅揭示了文本的生态意识,更引导读者思考如何在现实中践行生态价值,从而实现了批评从文本解读向生态实践的延伸。

程相占的理论促使批评家对那些貌似“非生态”的文本进行批判性剖析。一些现代文学作品虽然描绘了自然的面貌,可它背后隐匿的是对资源的掠夺、对野性的管控或对生态系统的简化。批评家能够运用“文弊”(cultural evils)这一“参

照”概念,即程相占所提出的“文化弊端”——“也就是‘文明’的对立面,描述它的三个形容词分别是与真、善、美相反的假、恶、丑”^{[5]76},来揭示这些文本中可能包含的生态价值误导。部分宣扬“征服自然”“改造河山”的文学叙事,尽管在特定历史阶段有振奋人心的功效,但从生态角度去分析,这些作品有意无意地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间接给生态破坏赋予文化层面的合理性。生态批评的任务就是要借助细致的文本分析,找出这些“审美暴力”的存在迹象,并倡导一种更具生态责任感的审美文化。

程相占生态美学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是其极大地扩展了生态批评的视野及边界。他明确地表明,“生态美学的建设就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8]5}。这表明生态批评不应囿于纯文学文本的疆域,而需拓展至更广阔的文化实践场域,涵盖生态纪录片、环境艺术、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乃至政策文本等多元形态。这种跨媒介、跨学科的批评视野,既契合当代文化研究的整体转向,也显著增强了生态批评的现实介入能力。以近年广受好评的生态纪录片《众神之地》为例,该片聚焦中国境内神圣自然景观及其守护者,深入呈现人与自然间的神圣关系。运用程相占的理论框架,批评家既可分析其影像美学特质,更可考察其是否体现“生生”哲学中“生命创生”的核心理念,是否彰显生态共同体整体的神圣性与完整性。片中藏族神山、傣族神林等文化意象,与传统生态智慧中的“场所精神”“神圣自然”观念高度契合,批评者可借此反思现代性对传统生态认知的解构,以及如何通过文化实践重建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结。在城市研究领域,程相占的理论为批判性审视“生态城市”或“绿色景观”提供了批评武器。许多城市公园虽标榜“生态设计”,实则暴露出人类对自然的过度规训——整齐划一的草坪、修剪成型的树木、人工雕琢的水景,本质上仍秉持“园丁式”自然观,否定生态系统的野性与自发性价值。批评家可依据“生态审美”标准,评估这些设计是否真正为野生生物提供了栖息空间,是否有效提升了生物多样性,是否增强了市民的生态认知与体验。这种批评不仅涉及美学判断,更与生态伦理实践及城市政策导向紧密关联,实现了批评从理论阐释向现实干预的延伸。

程相占提出的“生态智慧C”里面的“共同体”概念，还能用来分析政策文本或环保行动中的话语编排，分析在“碳中和”“生态文明示范区”等这类政策表述当中，是真实体现了对生态共同体的整体关爱，还是仅仅把自然当成资源管理的对象。生态批评可以凭借话语分析，发现这些文本里隐含的价值立场，并提出更能体现生态整体性的政策建议。

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理论通过构建“生生本体论”“生态智慧C”“生态审美”等核心概念体系，为当代生态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根基，提供了多元的话语工具与明确的价值标尺。该理论不仅深化了对生态美学本体论的哲学思辨，更通过确立“生态性”的核心价值地位，推动生态批评实现三大转向：从学科边缘走向中心场域、从现象描述转向价值批判、从文学研究拓展至文化实践。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其理论框架引导批评家突破表层自然描写的局限，深入挖掘文本的生态伦理意蕴；助力批评家构建跨越时空的对话视野，实现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的思想互鉴；激励批评实践向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延伸，促成美学理论与现实关怀的深度融合。这一理论启示我们：生态批评不应是孤立的文本解析技术，而应成为生态价值观引领下的文化实践行动。其要求批评家兼具生态学、伦理学、美学的跨学科素养，在中西智慧交融中探索批评创新路径。尽管该理论尚处发展阶段，但已为中国生态批评的范式转型提供关键动能。随着更多学者运用其概念工具开展实证研究，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理论有望在全球生态话语体系中发出更具分量的中国声音，推动生

态批评实现理论深度的持续拓展与实践维度的全面开拓。

参考文献：

- [1] 程相占. 生态美学构建与学术自信之建立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5, 35(1): 54.
- [2] 程相占. 文心三角文艺美学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88.
- [3] 程相占, 周思钊. 生态美学话语建构的本土性与国际性: 程相占教授访谈 [J]. 学术评论, 2024(4): 26.
- [4] 程相占. 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3).
- [5] 程相占. 生生美学的十年进程 [J]. 鄱阳湖学刊, 2012(6).
- [6] 程相占. 生生美学论集: 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
- [7] 程相占. 生态美学引论 [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1.
- [8] 程相占, 孙美娟. 中国生态美学发展状况及其话语建构: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程相占访谈 [J]. 社会科学家, 2019(10).
- [9] 程相占. 柏格森早期思想的康德批判及其生态美学意义 [J]. 东岳论丛, 2021, 42(10): 77.
- [10] 程相占. 生生美学的第二个十年进程 [J]. 南方文坛, 2025(3).
- [11] 程相占, 劳伦斯·布依尔. 生态批评、城市环境与环境批评 [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5): 13-14.
- [12] 程相占. 生态智慧与地方性审美经验 [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8.
- [13] 程相占. 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研究·主持人语 [J]. 山东社会科学, 2020(9).

责任编辑：黄声波